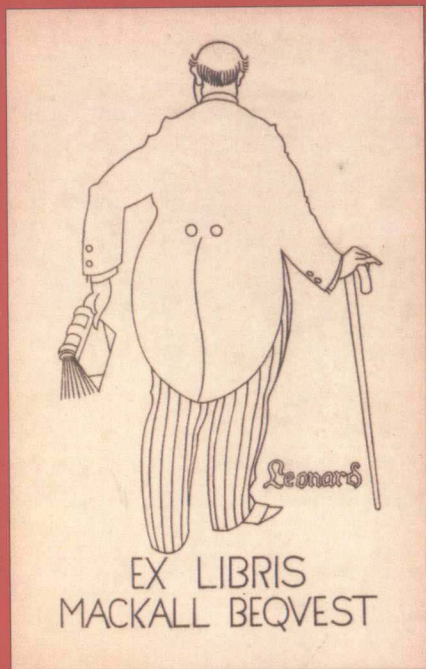


书商的旧梦

沈昌文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书商的旧梦

沈昌文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商的旧梦 / 沈昌文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8

ISBN 978 - 7 - 80678 - 753 - 3

I. 书... II. 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文集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7660 号

书商的旧梦

沈昌文 / 著

责任编辑 / 陈 琪 特约编辑 / 陆 源

技术编辑 / 张伟群 丁 多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82,000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 978 - 7 - 80678 - 753 - 3/I · 114

定价: 17.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目次

第一本历史教科书	I
从旧资料中学习	4
编辑工作的甘苦	7
人民有读书的自由	11
给“底气”	14
上苍的安排	17
宽容“淘气”	20
“爱得死脱”	24
旧时月色	28
脑后的那根反骨	31

若干乡谈	38
罪孽之一	43
感念闽籍翻译家	46
“重审”精神	50
于无意中得之	53
走老路得新果	58
文学版图和文化厨房	62
盛事可再	68
谁是衣食父母?	71
七十二·五十五·三	74
牛虻和虱子	78
老年时期	81
想做“三亚”人	84
不良成性	87
卫浩世的启示	90
自愧不如	93
阿拉伯数码之灾	97
文化追求	100

索引小事	103
《阁楼人语》后记	106
一头牛的看法	109
一个错字	113
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	116
俞晓群数术著作跋	121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六辑弁言	125
买它一本并不冤	127
一点想法	129
“看闹猛”小记	131
历史的转折	134
到北京去做“醒客”	137
听听邓丽君吧!	140
“任时光匆匆流去……”	143
“束诸高阁”	147

第一本历史教科书

不记得自己是否上过中国历史课。小时候上的是上海工部局学校，至今还背得出当时的英语第一课和日语第一课，但一点想不起在哪里学过中国史。半工半读上了大学，学的是新闻，也没上过历史课。真正看起历史书来，是一九五四年编辑部讨论出版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编辑部讨论得热烈，勾起我这小学徒的兴趣，乘机读了生平第一本历史教科书。

那时要出《中国史纲》，似乎是金灿然先生的主意。一九五四年前后重印解放前学术旧著，很热闹了一阵，直到一九五七年才戛然而止；又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大批特批此事；再以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又再走回头路。到目

前为止，这本书似乎已有三个本子：一九五五、一九九八、一九九九。退休后想补补自己中国历史的缺课，再次搜集诸本来读，学习历史之余，还真好好回忆了一番五十年来中国出版史的一角。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之讨论这本书，是研究如何出法。记得责任编辑是江平老大姐，人称江老太。江老太已谢世多年，她是三联书店编辑部难得的工作认真负责、为人耿直正派的资深编辑。当年讨论的是如何对待书中有问题的地方。几经研究，不得不将不符合当年史学标准处一一删节。但讨论到一个地方：书中说汉朝皇帝采取了刘敬的和亲政策，但又舍不得公主，只得用“同宗的一个不幸的女儿去替代”，而“单于所希罕的毋宁是麀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之类，而不是托名公主而未必娇妍的汉女”。这里“而未必娇妍”是否要删？说来话去，最后似是曾彦修、陈原先生拍板，凡可删可不删的地方一概不删，总算保留下来。这是当年领导的大胆敢为之处，自然在“文革”中又是罪名一桩。

说起编书要作删节，最是当编辑的痛苦而又不得不为之事。尤其是编翻译稿，洋人放言畅论，中国编辑要是放之任之，不仅祸国殃民，而且影响自己的饭碗。我同吴彬女士一

起编《情爱论》时，我主张既要重视作者强调肉欲的论点，但又认为必须删去论证这论点的不少论据。现在看来，实在痛心已极。后来同朱志焱兄一起编《第三次浪潮》，又不得不删去书中不少不符中国国情的话。后面这一举动，遭到了一位教授的正当的批评。他认为这一来，等于是美化了洋人，使我们的读者误以为这位作者对中国、对马列主义有正确的认识（至少是并没有误解）。这当然是个大问题。但如果照印不误呢？恕我说句不入调的话：我的饭碗肯定要丢了！

“文革”中，同三联老前辈史枚先生朝夕共同劳动，谈到过这类问题。他教我一法：作删节，但标出“此处已删多少字”。后来他主持编《读书》，就很想这么办。可惜的是，此老壮志未酬也谢世了。

读一九九八、一九九九版的《中国史纲》，觉得现在已把过去删节之处都恢复了，大是好事。更不要说两书都有精彩的导读或序言。（但一九五五年版亦略有可取之处，如上举槩字，后出两本作槩，谅解。）改革开放之有益于读书人，殆为明证之一。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从旧资料中学习

在我学习做书的历程中，除了因缘时会，得以在几位名家指导下做事外，受益最多的是当年的出版社有一个大资料室。

那时的资料室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余生已晚，颇难言其究竟。但是，印象极深的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曾彦修先生来社领导工作，对资料工作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本社职工可以进库任意阅览，资料库完全开架。现在想起来，要是当年没有这条件，我任什么也不可能像今天那样爱书、懂书。

资料室的内容丰富，得力于从事领导此事的金敏之、郑曼诸位的努力，另外，得力于接收了当年韬奋图书馆的藏书。韬奋图书馆是三联书店附设的一个机构，大概一九四九

年前在香港就有了。一九四九年后，在北京逐渐充实藏书。当年主持其事的衮衮诸公中必有俄语专家，因为我发现其中往往有意想不到的俄文书，例如我读的霍理斯，最初读到的就是那里藏的旧俄译本。另外，一九四九年以前出的本版书那里都有，于是就了解了自己单位的出版传统。

当年精力也真旺盛。每天一有空，就往资料室钻，一架一架地依次翻阅，值得注意的，借出来晚上读。于是，三几年下来，整个资料库几乎都翻遍了。大概可以做到，谈起某书，一瞥进书库，不用查目，即可找出。以此效率服务首长，想是上乘。

但是，最受用的还是你自己要组稿、报选题。脑子里有了一点主意，在资料室泡它若干小时，主意就充实了、完备了。退休后也试图利用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来做此事，却不能。因为你见不到实物，难以现场翻阅。等到十来本书陆续查出，借到，至少要花一整天，乃至一周。于是，像我这类惯于“急用先学”的浅学之辈，也许早又改变主意了。开架找书之益，老前辈也称道。如何封先生，他一查书就离不开资料库。例如原来要查 Hegel 的某句话，忽然从 Hegel 书中看到提起 Aristotle，于是又有兴致去看 Aristotle。这一来，

就难以脱身了。做书到这火候，可谓神矣！

跑书库实际上是一种书目学训练——做书的人基本训练之一。当然，我们的这种训练与学人不同。我们是浅炙，不是深究。但是，要是没有至少成千个书目存在于胸中，要顺利地编书、贩书怕也难。

我不知道韬奋图书馆的历史。读了那里的许多书，立即想到涵芬楼图书。那里一定内容更丰富。仰慕涵芬楼已久，始终无缘拜谒。但由此想起，为做书的人准备一个尽可能充实的书库，大概是老一辈出版家共有的远见卓识。我们常说要打品牌，要树立什么先进意识，但如果不在每个做书的人心中装进成千本书，怕是难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退休前忽然出现了某种“五十九岁效应”，妄图恢复韬奋图书馆。为这打报告，申请钱，穷忙一场。但终究惫懒，未能如老前辈办事之雷厉风行，勇于创业，终底有成。这不免是一件憾事。

家里还有一些从韬奋图书馆处理出来的三联版旧书，闲时翻读，不胜唏嘘。比起前辈出版家如曾公者，我们差远了。

二〇〇三年一月

编辑工作的甘苦

居家无事，偶理旧卷，读到老同事吴国英先生一九六四年二月的一篇旧作《编辑工作甘苦谈》，不胜感喟。

吴先生是人民出版社的老编辑，多年编马列著作，精娴英德俄语。他加工了普列汉诺夫著《没有地址的信》译稿，写了一个工作报告。此书是曹葆华先生所译，原书由苏联学者所编。按说是名著名译，编辑大可省心。但吴兄却没少费心，仔细推敲查改，不只加工了译文，更主要是改正了俄文版编者的许多疏漏。大功告成后，写出这一篇三五千字的报告，详述其中甘苦。

重读吴兄这一大作之前，正好看到报上一篇文章：《版权贸易喜人，译著质量堪忧》。文中讲当前翻译出版品上的

疏漏错误，实在惊人。例如，“一部文学作品中原作长达几页的描写，在中译本中竟成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八个字”。文中几句语重心长的总结性论断：“译德滑坡、学术腐败、编辑不济、市场混乱已成了译界、出版界的公害。”再回想近年来揭示的一些译本里的笑话，如门修斯之类（“Mencius”是西方学术界对“孟子”的标准翻译，一本国内学术译著将之再译为“门修斯”。——编者注），吓得我简直不敢买翻译书看了。

吴兄的这一工作报告，被当时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子野印送给主管思想文化的首长胡乔木。之所以呈送，原因我想也简单，因为《没有地址的信》中译文的某些问题，首先是胡乔木注意到的。他就此写一长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适夷，时间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四日。可能也因此，胡乔木看到吴兄的报告后，极为赞赏，复信给王子野说，“这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在编辑工作中的体现”。胡乔木的这些信，都收在今年出的《胡乔木书信集》里。

看看眼前这一堆文件、书信，似乎可以说：翻译书的质量实在是今不如昔了。但从出版全局看，似乎也不必作如是

观。就出书的路子看，实在是现在比过去宽。例如，我一直喜读潘光旦先生的译品，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某天，潘先生挟着一大批稿件，步履艰难地来到人民出版社，找王子野先生，希望出他译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稿。他的这一译稿，犹如他译的《性心理学》，特色之一是加了大量译注。在当年，一个个人，即使名声之隆如潘先生者，也不可能出一本个人自译的马恩著作，何况又去“佛头着粪”，加一大堆注释。其结局，自然只是“婉退”。多年来，我一直记挂这件憾事。尤其记得的是，潘先生见我说上海话，问我原籍，知是大场人，于是同我大谈他在宝山的情况。几十年后，我经手敢出潘译蔼理斯的《性心理学》了，但还不敢出恩格斯的这一译本。现在看到全稿已收在《潘光旦文集》之中，喜何如之。这应当是选题思路开放的一个著例。

但译文质量之下降，自然还是值得担忧。呼吁之后，必然会有解决办法。当然单单依靠如吴国英兄当年那样，一月挣百把元工资，拼死拼活，查找资料，即使其后誉以种种美辞，现在怕也不能行了。还得靠一些新办法。这办法总会想得出来的吧！

顺便说说，过去管思想文化的领导，管得也许太紧，但

是本人喜欢读书，往往有不少在行对路的具体指点，实在是我辈学徒生涯中的极好教材。上述《胡乔木书信集》即收有不少。但据我记得，似尚有漏收。如胡乔木给陈祖芬信（一九八〇年十月三日），其中谈语法修辞问题，我们当年都是很受教益的（例如不要用“人才们”这类说法）。

现在，想必还应常有这类指点，只是我个人见不到而已。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

人民有读书的自由

记得《读书》杂志，不必去记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记李洪林。原因很简单，李洪林在《读书》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文章：《读书无禁区》，由是使中国读书界大受震动，《读书》杂志其名大彰，直至今天。

我当时还没进《读书》大门。但是以后却不断要为此文去向领导作检讨。我当秘书出身，作检讨是行家，所以不以为是什么负担。由是收集了不少关于《读书无禁区》的材料，听到不少宏论，倒是一乐。我收集到了此文手稿，于是知道文章原名是：《打破读书禁区》（这篇手稿保存至今，最近万圣书园和百年翰林府酒家要举办关于《读书》的陈列，我已献出）。读了原标题后，看全文，觉得文章实在没多少违规，